

ZHONG GUO
GU DAI
WEN XUE
LIU PAI
YAN JIU
CONG SHU

HAN MENG SHI
PAI
YANJIU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钟林斌 李文禄 主编

韩孟诗派研究

钟林斌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顾问 余冠英 陈贻焮 朱眉叔

韩孟诗派研究

毕宝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孟诗派研究 / 毕宝魁著 ·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11

ISBN 7-5610-3914-X

I. 韩… II. 毕… III. 诗歌 - 文学流派, 韩孟 - 文学研究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9263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0.5

印数: 1-2,000 册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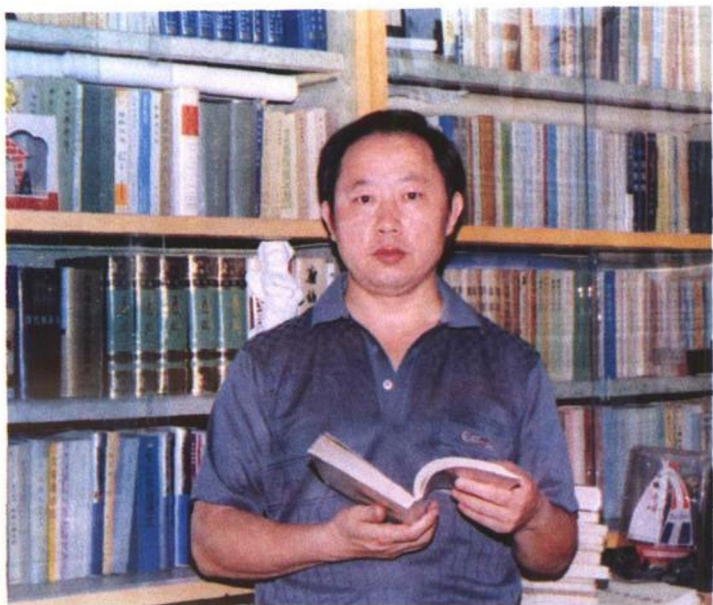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闻璐

责任校对: 宋绪连

特邀编辑: 王甫文

封面设计: 李勤学 刘桂湘

定价: 17.00 元



作者简介

毕宝魁 1952年3月生，汉族，辽宁铁岭人。1980年毕业于铁岭师专中文系。198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辽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辽宁省唐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出版专著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化史知识》、《奸谋·奸行·奸祸》（该书在台湾出版改名为《中国十大奸臣》）、《东北古代文学概览》、《移祚兵泉——朱温》、《新注花间集》、《唐诗三百首译注评》、《宋词三百首译注评》、《官场倾陷》、《王维传》、《李商隐传》、《李清照》等15部。其中《东北古代文学概览》是东北文学研究的发轫之作，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参编《历代赋辞典》、《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古诗景物描写类别辞典》、《三李诗鉴赏辞典》等大型图书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编者前言

“派”、“流派”这两个词在我国典籍中很早就出现了。《说文》云：“派，别水也。”（段注：派本作辰。）“辰，水之袞（同邪一引者），流别也。”^①派，指水的支流。“流派”与“派”是同一个意思，如唐高宗时人张文琮在《咏水》诗中写道：“标名资上善，流派表灵长。”^②用“派”来概括文学创作的派别，大约在北南宋之交才开始。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③、杨万里（1127—1206）作《江西宗派诗序》^④、刘克庄（1187—1269）作《江西诗派总序》^⑤等，可以说是对文学流派自觉认识的标志。

所谓“文学流派”，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的作家之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⑥。这个界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我国古代的文学派流形态各异、情况复杂，但总起来看不外乎两种类型，一是自觉型，一是非自觉型。

自觉型，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有某一杰出作家，不但以自己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一篇上二，十一篇下。

② 《全唐诗》卷三十九。

③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

④ 《诚斋集》卷八十。

⑤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⑥ 新版《辞海》第3519页。

的创作实践影响着同时代的追随者，而且发表创作纲领和文学口号，加以引导；领袖人物与追随者之间往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书札往来，唱和切磋，衣钵相承，不但产生了一批风格相近似的作品，而且结成了文学见解相接近的创作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在活跃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名目。一般认为，“江西诗派”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结成的诗歌流派。然而，这一派的宗主黄庭坚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江西诗派”这个名称。这事实说明一个道理，在我国古代即使是自觉型的文学流派，其命名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往往是晚于流派本身的形成。像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桐城派”，都应是属于自觉型的文学流派，但它们的名称并不是当事人自己标榜的。所以，我们观察古代文学流派，即使是如上述自觉型的流派，也不能先看它们在形成当时是否挂起“招牌”，而是要更加注重它们的“货色”，即它们是否够得上一个流派。对自觉型的流派是如此，对非自觉型的流派，更应如此。

所谓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是指该流派在形成过程中并不存在自觉结合的创作群体，也不存在有某个领袖人物发表创作纲领或口号去吸引追随者，而往往是由于历史的、时代的以及创作主体的诸多原因，有一批作家同前辈（或同辈）某一天才作家之间，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心灵上达到契合，从创作题材选择到审美趣味、表现技法等方面有所效仿和师承，从而形成在审美取向和艺术风格上同中有异、异中见同的作品系列，这样的系列往往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但从中仍可以发现作为流派的脉络和特征。这种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起码在唐代就出现了。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即是。对此，明清时期的诗评家已有所认识，如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曾指出：“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

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① 这里显然是肯定了以陶潜为鼻祖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田园山水诗派的存在。近30年来在我国大陆影响最大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即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都明晰地标明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②。文学所三卷本则指出：唐代“是一个名家辈出，流派众多的时代”^③。这说明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这样的提法已得到当代比较多的学者的认同。唐以后，自觉型的文学流派不断涌现，但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如宋词中的婉约派、豪放派，元杂剧中的本色派、文采派等等。

由于人们对流派的界说持有不同的看法，某些学者也许要否定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的存在及种种名称。但是，对多年来已被习惯概括为某某派的文学现象总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与其蔑视这些名称，不如对这些名称背后复杂的文学现象作一番深入研讨，弄个水落石出。事实上，古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流派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虽然对个别流派有过专门性的系统研究成果（如桐城派），但许多流派只是被学者们在论著中稍稍提及而已。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顾名思义以古代文学流派为研究对象。本丛书要在详细占有材料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对某一流派的形成、发展、鼎盛、衰微、影响，以及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内容、风格、审美特征等等作出清晰的分析和描述，着力探寻政治、经济、宗教、哲学、艺术、习俗、风尚等等社会历史的因素以及文学发展内在的和作家自身的因素对文学流

① 据《四库备要》。

② 见游国恩本第四编概说及文研所本第二册第一章《唐代文学的繁荣》。

③ 同上书，第二册第331页。

144 5/105

派形成所起的作用，同时深入揭示文学发展史上的某些规律，从而深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使“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气。

我们的上述想法得到海内外许多学者的赞同和支持，认为这是一项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纷纷来函表示愿意承担其中的某项研究任务，对此我们深受鼓舞。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冠英先生，著名唐宋诗词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贻焮先生，著名明清小说研究专家、辽宁大学教授朱眉叔先生，接受我们的邀请，欣然担任本丛书的学术顾问，更增加了我们搞好这套丛书的信心。我们初步拟定下列选题：

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边塞诗派研究

新乐府诗派研究

豪放词派研究

婉约词派研究

唐宋派研究

公安派研究

浙西词派研究

桐城派研究

性灵派研究

.....

值得说明的是，这套丛书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并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审定为国家“八五”期间重点出版书目。从1992年开始，每年将有三五种著作与读者见面，以后陆续出版。

作为这套丛书的主要策划者、主编，我们恳切地希望专家学

者和广大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期提高书籍的质量。同时，我们更欢迎就丛书中提出的学术观点展开争鸣，使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增加几分活力和波澜。

钟林斌 李文禄

1992年3月31日

序

傅璇琮

大约十多年前在太原召开的第四次唐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结识了毕宝魁同志，并对他提供会议的《王维生年考辨》论文很感兴趣。关于王维生年，学术界认为向有定论，不必再议，而毕宝魁同志则从王维诗句实际出发，进行细致的考辨，提出新见。我觉得学术研究应有思辨精神，特别对年纪较轻的研究者，我们更应珍视。后来我与他作一些具体讨论，他也作了一些修改、补充，我把这篇文章推荐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文献》学刊上发表，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在这之后，宝魁同志的研究大致分为两路。一是关注东北文学的历史发展，后来撰成《东北古代文学概览》一书。此书勾勒出东北古代文学的大致轮廓和发展脉络，材料宏富、考证翔实、结构清楚、新见迭出，拓展中国文学史地域性研究，表现出难得的开拓精神。另一方面则仍沿着唐代文学研究的路子走，近几年来出版了《王维传》、《李商隐传》，这次又推出《韩孟诗派研究》。但他并不完全依照传统模式的格局，而是努力在作家作品研究上渗入时代的意识，并把专业研究与拓宽普及面结合起来，力求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易于为现代人所接受。我觉得这样的治学格局在现在是很值得探索和倡导的。

韩愈研究一直是个热门，有褒有贬，这种褒贬过去往往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而在研究者来说，则视野不免有所偏，对韩愈作品的探讨很不全面。近二十年来，情况大有改变，中唐诗歌的流变也受到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关切，已有好几部专著问世。

本书是正式把韩愈倡导的诗派作为专题来研究的，比较全面地把韩愈诗派的形成过程，如时间、地点、主要人物、队伍形成情况等作清晰的论述，并将韩愈诗派放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使人有具体的历史感。书中重视从资料出发，来作理论概括，在充分占有和运用资料的前提下，阐释韩愈诗派的特点，使人有充实感。如引征韩愈、孟郊诗近百首，李贺、贾岛诗有五六十首，卢仝、刘叉等人诗也在二十首左右，这对读者认识这一诗派的总体诗风很有帮助。

对诗派的研究，现在有些书往往偏重于作所谓宏观把握，不对作品作具体分析。宝魁同志是一向重视求实学风的。书中对韩愈《感春·五首·其三》一诗之考释评析甚为透彻，对卢仝《与马异结交诗》进行全篇讲析。这样的作法，过去同类著作是少有的。有些争议的问题，如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及参加进士考试受阻之时间，贾岛初见韩愈的地点与时间，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当然还可讨论，但这种独立探讨的作法，以及问题提出的视角，是能给人以启发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成果已经不少，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似乎更受到学界的赞誉。但随即就产生一个问题：这种研究如何更往前推进，如何引向深入。这个问题如不引起注意，并探索新的路子，则很可能就维持现状，重复写作，来回虽有走动，实际仍是原地踏步。

从宝魁同志的这部书，我想到，我们要把现有的研究再往前跨进一步，就要扩大作家作品的探索面，并把作家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更好更细的结合起来，使人觉得这一作家确是一个活的人，有个性的人，有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特色的人。要努力显示古代文学的原貌，使我们今天能走近它的时代。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他研究的《诗经》，总是努力要“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前辈的这些话是很值得我们思索的。

但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空想，或是一种幻想，不切实际。但我觉得我们是不妨从这方面试着作一作的。我在八十年代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就不是按照学科性的写作方式，而是从唐代人所写的作品（包括诗、文、笔记、小说），把唐代士人的种种情况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共同关心的社会现象，作整体的描述。这里不妨以韩愈为例，谈一些我的看法。过去把韩愈往往写成儒家正统人物，是思想界、文学界的领袖，好似现在一些社会名流那样，摆出一副架子。实际上韩愈是一个平常的人，容易理解的人，有自己头脑的人。譬如他在早期，即德宗贞元时写给友人崔群的一封信，其中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施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为何，无乃所好恶与异心哉？”这篇《与崔群书》是不大为人注意的，尤其是这段话，似还未有人说起过。我在一篇短文中引述这段话，说读到这几句，自然会想起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叙》。韩愈一开头就说，自古以来，就是好人少，不象样子的人多，而至现在，则贤者往往没有好的境遇，即使谋得一个低级位置，过不久也就死了，而不贤的人却总是能做到大官，而且志满气得，长命百岁：这，天意何在呢？试问：韩愈这里发牢骚已发到什么程度？另外，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朝廷下令，说为减轻京都负担，明年暂停科举考试。韩愈这时任国子四门博士，自称还不算“朝官”，但却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状，以为不宜停试。就事论事，这不算什么，但韩愈在这份奏状的后部分却忽而引出一个高调，说“今者陛下圣明”，即使古代的尧、舜也及不上，但朝中群臣，其贤“不及于古”，“又不能尽心于国”，于是突然下了八个字：“有君无臣，是以久旱”。这确是触目惊心的。试想，当今的皇上德宗能比得上古代圣君尧、舜吗？这大家心里都明白。“无臣”是怎么造成的，不是这个“君”的责任吗？“有君无臣”，实际上是对当时朝政的全盘否定。这在史无前例的十年

“文革”中，是会作为“现行反革命”而抓起来的。

韩愈的有些行为也是值得提一提的。李翱所作《韩公行状》，说韩愈于元和时官职升迁，任国子祭酒。有一位教官（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而当时在国子监当学官的“多豪族子”，看不起这位直讲，不屑与他同桌吃饭。韩愈知道后，就让差吏把这位直讲请来，说“与祭酒共食”。大家知道，国子学是当时设在长安的最高学府，入学的，“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新唐书·选举志》）。也就是，国子学的学生，差不多都是高干子弟，那末在里面教出的也多是“豪族子”，当然看不起这位非“豪族子”而“陋于容”的直讲。但韩愈作为最高学府的校长（国子祭酒），却能作出如此异常的举动。

韩愈还有不少超常的举止，其他如孟郊、李贺、卢仝等也有值得注意的特异行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多讲。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与其诗歌风格是有有机的关系的，很值得我们今人思考。

韩愈是很讲究道统的。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研究者一般以为韩愈这里是以孟子传人自居的。北宋时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也含有此意。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认为“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之人物也”，并认为韩愈一方面总结儒家道统之说，而另一方面又“开启宋代新儒家治经之途径”。但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新儒学，并不承认韩愈的道统地位。宋代理学家认为韩愈虽然提倡道统有功，但他本人的思想并不纯正，因此，一般把他排除在道统传承之外。朱熹在《大学章句序》里明确提出：“河南程氏两君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南宋的黄幹在《朱子行状》中，更进一步把朱熹列进去，

说：“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因此说韩愈下接宋以后新儒子，对宋代新儒子有开启之功，事实是否为此，尚待商榷。但这不能贬低韩愈，我个人认为这反而可以说明韩愈思想确非儒家道统所能拘限，这恰恰是韩愈可贵之处，也是宋儒所不能理解，或虽有理解而不能接受的。

这是我读了宝魁同志这部著作后所得到的启示而产生的一些感想。宝魁同志尝试着想把学术著作与普及结合起来，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轻松愉快的文学作品，尝试着走一条学者兼作家的道路，这一想法颇有时代意义，在本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书中列韩愈为诗派的旗手，孟郊为先锋，李贺为大将，卢仝、刘叉为怪将，贾岛等为偏将，可能有些研究者对此会有意见，但这未尝不是学术研究走出自己小天地的一条新路。宝魁同志还在进行辽宁省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东北文学史”研究，他正当事业有为之年，这样把学术面作适当的拓宽，从整体上说对自己的治学格局是有利的。希望宝魁同志创新、求实之作络绎问世。

1999年6月于北京

序

孟庆文

近日，毕宝魁同志把他新著《韩孟诗派研究》书稿送给我看，让我给书写篇序言。书序不外是介绍书的内容和优缺点。读过书稿之后，我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即“文如其人”。欲知其书，不如先知其人。为此，我想还是先介绍其人为好。

宝魁同志与我结交已有十余年之久。他先从我学习，后与我合作编书，同时每年助我办理“辽宁省唐代文学会”诸多事宜。他是我的学生、合作者，又是我的有力帮手。因此我对他的为人和才识有比较深刻了解。他淳朴好学，明敏勤奋，才识兼备，勇于探索，又富有开拓进取精神。他给我留下第一个印象：连考数次研究生，三挫而不灰心，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取。他这种坚强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此后，我常用此一事例勉励后学。

他的另一使我赞佩的事，是撰写《东北古代文学概览》。东北古代有如一片沃野，将它开垦成良田，委实困难重重。宝魁自起炉灶，独辟蹊径，广集资料，条分缕析，日夜兼程，仅用一年时间而完成。今日看来，此书虽未臻于完美，但其填补空白，功不可灭，而其开拓进取精神，更令人刮目相待。

宝魁同志最多的科研成果，主要表现在他对唐宋诗词研究和撰写古代人物传记两个方面。十几年来，他独自著述和与他人合作的书竟有三十余种。仅与我合编的书就有十五种。其中大型书籍，有《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五卷）、《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二、三分册）、《中华奇杰志》（共六册）等。他独自撰写的，主

要有《花间集注》、《宋词三百首译注评》、《王维传》、《李商隐传》、《李清照》等。其中力作，当属《韩孟诗派研究》。在这一领域里，虽然有人已着先鞭，但他另辟蹊径，精心探索，再展风光，亦实可贵。

从宝魁同志所写多种著作和一些有新见的论文来看，他已具备攀登科学高峰的基础，如能继续发挥其才智、勤奋和开拓进取精神，足以胜任广大科研课题，但望能勇承重担，多结硕果，方不负众望所期。

去年宝魁同志曾提出编写《东北古代文学资料丛书》的宏伟计划，令人赞赏。这是一项重大工程。从事此一巨制，必须有充实的人力物力为后盾；兼之以严谨的治学之道，不为利诱，不为物牵，无媚于时，无求速达；再加以坚强的毅力，开拓进取的精神，方可望其有成。我已至耄耋之年，惜不能助一臂之力。但寄望于未来，在我有生之年，希望能看到祖国传统文化再现新的光辉！在此谨以小诗做结，表述心声。

曩昔栽桃李，
何曾计苦辛。
夕阳风物好，
尚有看花心。

1999年8月25日

导 言

中国诗歌的历史极其悠久，滥觞之源难以确知，即使从已有相当规模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之作品开始算起，中国诗歌的历史也已超过了三千年。她也和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一样，从遥远的古代向我们流来，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气象万千，支流众多。

仿佛和现实中的河流一样，诗歌发展的长河亦有源、有流、有派。“源”是水的源头，其本字为“原”，从“泉”，是水流之端倪。“流”则指河水运行的形态和过程，亦指整个水流而言。“派”是水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别水”。诗歌的发展亦如此。仔细体味，研究诗歌发展史，也就是探讨研究诗歌发展的源、流、派的历史。“派”是从总的水流中又分出岔来，形成“别水”，流过一段途程再汇入主流。“派”离不开主流，既受主流制约而又对主流产生影响，因此对流派的研究探讨就离不开对整个水流总体的了解和把握。本书研究探讨的对象“韩孟诗派”即属于这样的“别水”，它是在中唐时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是一个客观存在，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韩孟诗派之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学尤其是诗歌内部发展的原因。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李唐王朝的盛世已经成为过去。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整个社会却出现了病态，最严重的两大毒瘤就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朝廷已不能完全控制整个国家，皇帝的权力受到很大削弱。连年的征战造成社会经济的凋敝，人民生活陷入苦难的深渊。思想界也出现极其混乱的局面，佛道两教极度兴盛，一直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受